

# 新历史主义方法论与《秋颂》研究

——论济慈诗歌文本阐释的一个基本原则

卢 炜

---

**内容摘要:**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新历史主义逐渐成为济慈诗歌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济慈研究的发展。但是,新历史主义理论对济慈《秋颂》的阐释原则可能导致评论界在分析和解读文本时产生两个重要的理论局限:过度强调社会现实性和忽略想象力的作用。以《秋颂》等多个济慈诗歌文本为例,新历史主义理论在济慈诗歌研究领域应该恪守一个基本原则:即在重构社会历史语境时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但要控制进入文本解读和阐释领域的欲望。

**关键词:** 济慈;《秋颂》;新历史主义;文本阐释;基本原则

**作者简介:** 卢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诗歌、翻译研究。

---

**Title:** New Historicism and “To Autumn”: A Principle in Interpreting Keats’s Poetry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1970s, New Historicism has been playing an instrumental role and making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Keats Studie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To Autumn”, the theory of New Historicism may cause two fundamental theoretic limitations, namely, the overemphasis on social reality and the negligence over the effect of imagination. Citing “To Autumn” and a few other Keats’s poems as exampl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New Historicism in the study of Keats’s poetry should adhere to one basic principle: take full advantage of its insights in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historical context, but limit our reliance on it in textu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Keats; “To Autumn”; New Historicism; text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

**Author:** Lu We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Email: benjaminlw@pku-edu.cn

---

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济慈诗名的稳步提升,《秋颂》(“To Autumn”)获得了西方评论界的一致赞誉:在学者们眼中,《秋颂》是济慈“最伟大”(Ricks 208)和“最好”(Vendler 234)的颂歌,不仅“完美无缺”(Hartman 133, Bloom 9),而且能够

使读者产生“心之所属”（Bate 581）“别无所求”（Fry 271）的“满足感”（Mellor 107）。而 20 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在对《秋颂》进行文本阐释和主题分析时，西方评论界一直关注该诗的隐喻和象征意义（Unger 187）、感官感受（Finney 2: 707）、整体风格（Tate 264）、稍纵即逝的美（Evert 297）等，基本上围绕着诗歌“审美”的范畴开展论述，很少涉及其他非文学阐释和理性批评。

## —

20 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更多以历史、社会和跨文化阐释为依托的全新的实证派评论开始进入《秋颂》研究领域，并使济慈诗歌研究和文本阐释发生了重大转向。期间，杰里米·麦克甘撰写的《济慈和文学批评领域的历史主义方法》对这一转折起到了巨大的催化和推动作用。麦克甘一反过往济慈研究者从诗歌“审美”角度入手的感性批评框架，指出“历史主义可以为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文学批评开启全新的视野”（McGann 999-1000），而这种全新研究方法的关键，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学”批评，也不是评论界熟识的、但被麦克甘称为“伪历史”的“人物传记式”的“文学史”研究（McGann 1013），而是以描绘“清晰的社会语境”为目的，重构文本产生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背景（McGann 1015）。因此，诸如诗歌主旨、诗人的“审美主张”、诗人生平经历与创作的关系等重要的问题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意义，而一首作品“何时、何地、被何人出版”成为了决定整首诗社会背景的核心（McGann 1015）。在这个理论框架的指引下，麦克甘全面分析了《秋颂》产生的时代大背景和济慈创作出版该诗的历史小环境，认为济慈故意淡化秋天萧杀的氛围，转而营造一种古典主义浪漫色彩的宁静、安详和美，使读者乐于接受这样一个虚幻的秋色（McGann 1019），其实是诗人为了逃避个人和社会压力而寻求的避难所（McGann 1021）。

麦克甘倡导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在济慈诗歌研究领域激起了轩然大波，以沃尔夫森（Susan Wolfson）、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考克斯（Jeffrey Cox）等为代表的评论家开始以崭新的、历史的视角审视曾经无比熟悉的主题。又经过十余年的沉淀与发酵之后，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济慈研究领域全面开花结果，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引领了济慈研究的时代大潮，开启了新历史主义济慈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此时的新历史主义济慈研究不仅沿着麦克甘开创的“重构宏观历史背景”（McGann 1015）的道路继续前进，而且，不断深入到此前未曾广泛涉足的济慈诗歌文本阐释领域，其中，尤以尼古拉斯·洛（Nicholas Roe）的《济慈与异见文化》（*John Keats and the Culture of Dissent*, 1998）最引人瞩目。在整体脉络和方法论层面，洛主要因循了麦克甘的大历史、大背景和宏大叙事，较为客观地勾勒出济慈与其时英国以李·亨特（Leigh Hunt, 1784—1859）等为代表的左派自由主义者的互动关系，为研究济慈诗歌与 19 世纪初期英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历史语境的关联提供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思路。但是，作者突破了此前多数新历史主义评论家阐释的边界，将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应用于阐释文本内具体字句、意象和语篇的含义，在微观层面进入诗歌文本的大量核心地带，得出很多新奇的结论。特别是在全书最后一章，作者根据《秋颂》创作的时间节点（1819

年9月)和济慈书信中提到的只言片语,推测出因为济慈参加了欢迎异见人士亨利·亨特(Henry Hunt, 1773—1835)的集会,所以一定在其后创作的诗歌《秋颂》中映射了当时的时事(Roe 253-254),并且,利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作者将《秋颂》第一诗节里一个从未被评论界重视的动词“密谋(conspire)”与时政联系在一起,暗指济慈借此讽喻英国政府(Roe 254-255)。这部著作的观点在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风起云涌之际,对该派理论的构架和深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在该书出版十多年之后,仍有评论家将该观点奉为圭臬、推崇备至(Turley, *Bright Stars* 106)。

在新历史主义大潮逐渐褪去、多元文化阐释逐渐兴起、“审美派”文本阐释逐渐回暖的今天,我们重新以客观、冷静和理性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新历史主义及其代表的一套文学批评伦理在分析济慈诗歌作品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笔者看来,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在阐释和分析济慈诗歌作品,特别是《秋颂》时,在以下两个层面值得商榷。

## 二

运用新历史主义研究济慈诗歌出现的第一类问题在于用一元的、泛社会化的话语体系取代和替换本应是多元的文学评论系统,客观上造成了济慈诗歌研究领域的单向思维,影响了研究的整体性。

首先,新历史主义及其代表的论述逻辑的大前提是将一切文本和作家的创作置于宏观的历史语境之中,即其强调的“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但是,这个研究路径在济慈诗歌研究领域有一个缺陷:在该话语体系中,研究者很容易过度关注研究目标和结果的社会属性,最终,削弱了以济慈诗歌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美学、哲学和艺术价值,因为,非现实和对美和艺术价值的追求正是济慈不同于其他主要浪漫主义诗人的显性特征,而对济慈的诗歌作品进行过度的现实主义解读,会与济慈诗歌的艺术审美发生无法调和的矛盾。

其次,新历史主义论证的逻辑小前提也可能禁不住仔细的推敲。且不论《济慈和异见文化》一文强行在济慈研究文本阐释与历史史实之间建立关系,即便是麦克甘更为含蓄和理性的新历史主义观点,其立论基础也并非无懈可击。学者奥鲁克就曾指出麦克甘根据“何时、何地、被何人出版”(McGann 1015)这一基本原则,将《秋颂》定义为“公众诗歌(public poem)”时,忽略了济慈在完成该诗后,首先将其寄给了朋友伍德豪斯(Richard Woodhouse, 1788—1834),并且在信中和友人雷诺兹(John Reynolds, 1784—1852)畅谈创作该诗的感受,因此,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诗(personal or private)(O'Rourke 156-157)。奥鲁克还指出麦克甘在分析《秋颂》时,使用的是1819年3、4月份之间历史语境,而非该诗创作时的1819年9月,因此,不能说明诗人当时当地的创作意图(O'Rourke 156-157)。奥鲁克没明确指出新历史主义的观点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但是,沿着他的逻辑思路我们不难分析出:既然新历史主义方法论的逻辑前提不成立,《秋颂》实际上首先是一首友人和拥趸间传阅的、私人的诗,并非为了出版或者宣扬某种理念,那么,当代评论者将现实意义附加在诗歌

文本上，并且将其凌驾于审美和艺术性之上，其实是本末倒置。

最后，如果说新历史主义对《秋颂》的现实主义阐释只是冰山的一角，那么更令当代济慈诗歌“审美派”不能释怀的可能是隐藏在海面之下的冰山主体：新历史主义济慈研究的批评伦理体系。如果这个批评体系全力出击，渗透至济慈诗歌批评和文本阐释的各个方面，按照其固有的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进行无限制推演之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严重到影响济慈评论领域的整体发展：如果大到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小到诗人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被置于新历史主义的放大镜下审视，这些事无巨细的因素都被贴上历史的、社会的标签，那么，每一首济慈的诗歌都只能是现实的折射和衍生物。比如，有新历史主义学者认为《夜莺颂》中露丝（Ruth）这一圣经人物是用来映射 19 世纪初期饱受饥荒肆虐的英国“拾穗者（gleaners）”（Bennett 36-37），借以同情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那么，1818 年 1 月创作的十四行诗《我担心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When I have fear that I may cease to be”）同样出现了拾穗者的形象，这似乎又无法用历史的或者社会的人物来对应，因为这是一首诗人表达自己内心创作焦虑的抒情诗，很难有现实的针对性。同理，有学者指出济慈的《海皮里安》（“Hyperion”）可以被解读为“诗人通过该诗的中断和残篇反映了英国自由改革事业的终止”（Friedman 99）。那么，按照新历史主义济慈研究的逻辑，《圣阿格尼丝之夜》（“The Eve of St. Agnes”）中女主人公玛德琳的私奔也可以理解为她同代表资产阶级贵族阶层的过去的自己决裂；《拉米娅》（“Lamia”）中赫尔墨斯追逐林中仙子，也可以解读为代表强权的帝国主义者对弱小民族的凌霸。然而，多数读者和学者很容易觉察出这些观点不合情理，因此，同一个意象究竟在哪种语境下可以做历史主义的解读似乎令人难以捉摸。推而广之，如果一切文学的意象和文本的细节都被置于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下，评论者可以产生无尽的遐想，难免会导致评论界产生对新历史主义的路径依赖。如果，一味强调与现实世界和社会历史因素挂钩，济慈诗歌的美学、哲学和艺术魅力将可能被理性主义话语体系取代，对人类永恒真理的探索有可能蜕变成现实主义的机械模仿，最终的结果很容易伤害到济慈研究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 三

运用新历史主义研究济慈诗歌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试图用实证主义方法论取代文学审美，最终导致济慈诗歌想象力的全面退却。

麦克甘指出：“诗歌并不能够举起一面镜子，反映静止不动的人性；诗歌反映并思考人性时，只能借助社会和历史的现实”（McGann 1026）。一切文学作品中描绘的现象都应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到对应的映射物，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语境。按照这一思维逻辑，麦克甘推演出《秋颂》中一个著名的悖论：

《秋颂》希望我们相信一切秋天都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些秋天都想象成“暮霭沉  
沉果实丰满的季节”。但是济慈让我们相信这些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这是假的。这  
样完美的丰收季节只存在于头脑中。除了在艺术作品中，后工业化的城市居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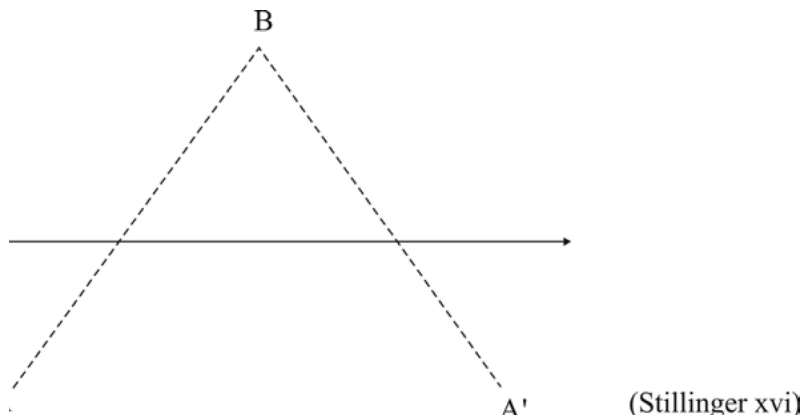


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场景，而在乡下，这样的丰收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在19世纪早期。实际上，1819年英国是个丰年，但这种“丰收”也仅仅是因为之前的几年英国接连遭受了严重的歉收。（McGann 1021）

我们尊重新历史主义者对史实的尊重，但是，这段经典表述暗含的一个逻辑可能很难令坚信审美至上的评论者接受：因为济慈当时看到的是秋收之后，满目萧条的景象，所以济慈创作《秋颂》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济慈虚构一个不存在的秋景其实是为了逃避现实。而为了打消怀疑者的疑虑，就有学者为济慈在书信中描写的秋景和《秋颂》中的不完全一致进行了辩解，说他这样写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填补上绚丽的色彩（Vendler 256），用想象填补了秋收之后的萧瑟（Vendler 258）。

新历史主义济慈研究在此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理论误区：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要严格遵从社会现实，对客观现实进行艺术加工是很多艺术创作的基本逻辑。否则，所有的艺术，特别是视觉艺术都将失去存在的土壤。试想，如果只能根据现实进行创作，那么绘画领域除了写实派，其他如立体派、抽象派、超现实主义作品都将是无稽之谈；甚至写实主义本身也可能失去了根基，毕竟在现代数码摄像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拍一张千万像素的照片更加真实地再现现实易如反掌，再经过修图 and 美化，可以产生出无穷无尽的效果。但是，那些国际艺术拍卖行里动辄上亿美元的名画用事实不断告诫我们，绘画艺术永远不会过时。退一步讲，即便是绘画艺术被更真实、更依赖当代科技的摄影艺术所取代，我们也无法得出结论：更真实代表着艺术上更大的成就。摄影术也讲究光与影的配合，同一景物在不同的技术手法处理之后，呈现的拍摄效果也大相径庭，那么，究竟哪种效果代表更真实的存在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济慈描写的秋色也是同样道理：在诗人借助诗的翅膀，打开全视角模式审视秋天的各个层面时，通常意义上的真实已经被艺术净化之后的真实所取代，而这个净化的手段就是想象力。济慈诗歌中的想象力具有无穷的力量，可以使想象力的持有者发生思想上的升华和质变。著名济慈研究学者斯蒂林杰曾用一个著名的简图阐述过济慈诗歌中想象力（梦）的作用：



图中的 A 点代表了处于现实世界 (actual) 中的诗人 (或任何梦境中的人), B 点则代表经历了想象力的飞升之后, 诗人来到了理想的世界 (ideal), 由于某种原因, 诗人不得不从理想的世界回到现实的 A' 点, 但经过想象力加工萃取和升华之后的诗人已经发生了质变, 即使面对同样的景物, 心态和感悟已经与之前判若两人 (Stillinger xvi-xvii)。济慈也曾在书信中对想象力做过精彩的比喻和阐释:

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 只除了对心灵情感的神圣性和想象力的真实性——想象力以为是美而攫取的一定也是真的一一不管它以前存在过没有——因为就像对爱情的看法一样, 我对我们所有激情的看法都是, 它们发展到极致时都能创造出纯粹的美——简单点说 (……) 想象力与亚当之梦好有一比——他一觉醒来发现一切都成了现实。(《济慈书信集》51)

在济慈心中, 想象力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无以伦比的力量, 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像上帝创世一样, 创造出一切。只要想象力抓住了哪怕一个美丽的瞬间, 这个瞬间就代表了真实; 哪怕这个瞬间客观上从未存在过, 只要诗人心中有它一个位置, 这个瞬间就是真实的。因此, 即便济慈在创作《秋颂》时, 没有看到诗中描绘的美景, 诗人过往的经历, 对美的敏感和执着的追求, 都在创作的那个时刻通过想象力幻化成诗歌的语言和形象。济慈曾说过: “(拜伦) 写他看到的東西——我写我想象的東西——我的任务至为艰巨” (《济慈书信集》413)。因此, 济慈笔下的秋天不一定要有一个现实的蓝本; 而即便是有, 这个蓝本也未必就是风起云涌的 1819 年。

即使新历史主义者一定要给《秋颂》套上一个现实的范本, 1819 年 9 月 21 日那个下午温彻斯特的乡间美景也足够激发济慈强烈的创作欲望了:

现在这个季节多么美妙——空气真好, 温和的犀利, 说真的, 不是开玩笑, 是那种贞洁的天气——狄安娜的天空——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喜欢收完庄稼后的茬田, 是啊, 它比春天里冷冰冰的绿意要好多了。不知怎的茬田看起来很温暖——同样的道理某些绘画看上去暖和得很——我星期天散步时, 这种思想是我触动如此之深, 以至于我沉吟起来。(济慈, 《济慈书信集》385—386)

面对这样一段充满感情、充满生命、洋溢着温暖的文字, 每一位读者几乎都可以感受到济慈内心的创作冲动; 面对着这样交织着视觉 (黄绿色对比)、嗅觉 (清新的空气)、触觉 (温和的田野) 碰撞的美景, 欣赏并沉浸在美景之中可能是每一个济慈爱好者的第一反应。济慈的诗歌美学里想象力是可以超越客观物化的世界, 跃升至主观的无我境界; 想象力也是可以化作触及的一切, 像一个永不熄灭的发光体一样去充盈和照亮一切, 如同济慈在著名的《诗人无自我》 (“A Poet has no Identity”) 中所言: “他 (诗人) 要不断地发出信息, 去填充其他的实体——太阳、月亮、大海, 世上的男男女女, 作为有冲

动的生灵，他们都是有诗意的，因此，都有不变的特征”（《济慈书信集》214）。诗人就需要像蜡烛一样燃烧自我，将想象力像烛光一样散射到世间万物之上，去填充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时，诗人自我的流失意味着孕育了更高尚和纯粹的超我，这样才能产生真正跨越时空间隔的伟大作品，而这种艺术的真实是优于现实的真实，也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艺术目标，也是艺术作品存在的最大价值。否认这种想象力的作用，也就是间接地否认了艺术的价值，即否认了人类审美需求的必要性，而这种颠覆式的结果想必也不是新历史主义济慈研究者希望看到的景象。

换言之，如果诗人不能借助想象力，只能对客观世界进行新古典主义式的机械模仿，《夜莺颂》可能失去现有的魅力：夜莺的象征意义，诗人穿越时空的冥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感觉的互通，白昼与黑夜的交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等一切当代研究赋予这首伟大作品的意义都将有所缺失。

#### 四

狭义上，重新审视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之得失有助于我们厘清历史，还原这次立场之争的本来面目，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重塑济慈研究领域当年的社会历史语境。广义上，这样的反思也希望通过对比和分析，理顺新历史主义方法论与济慈作品的关系，为其今后更好地在济慈研究领域发挥作用助一臂之力。

21世纪的济慈研究呈现多元化，新一代的新历史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更新潮的新历史主义观点不断渗透至济慈研究传统领域之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历史主义理应成为当今济慈研究界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新一代新历史主义者的观点更前卫、更大胆，然而，对传统的济慈诗歌审美研究可能更具有杀伤力。比如，在分析《圣阿格尼丝之夜》中男主角波菲洛（Porphyro）的形象时，有学者就指出他坚定地走向凶险的城堡也可以看作济慈坚定地面对自己文学上的敌人洛克哈特（John Lockhart, 1794—1854）等人（Turley, *Keats's Boyish Imagination* 33）。在学者们挖掘出一系列史实的前提下，我们无法否认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个观点的核心问题在于将文学争端社会化，而其背后隐含着—个逻辑：因为不满曾经受到的嘲弄，济慈通过文学作品报复蔑视过他的文人，而这样的行为使得济慈的道德和文品堕落到了和他无比厌恶的人在一个层次上，严重地玷污了诗人济慈伟大的品格。那个为了亲情和友情义无反顾、牺牲自我，为了诗歌创作甘愿舍弃一切的伟大诗人蜕变成一个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小人，这应该是每一个济慈的爱好者都很难接受的。

再比如，济慈叙事诗《伊莎贝拉》（“Isabella”）开篇的第105—120行一直被评论界认为是反映了诗人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控诉（Wootton 53），但最新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成果，在综合了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观点之后却认为几行诗描写的形象非常生动，足以激起感官上的愉悦，体现出济慈本人对金钱的向往和名利的追逐（Wootton 53-55）。我们无法否认终其一生都在与经济拮据抗争的济慈，希望通过模仿功成名就的作家尽快摆脱经济上的困境；我们也应该承认济慈心中一直有“成为伟大诗人”的梦想和决心（Keats,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 394），但我们不应该根据文本中的只言片语，

展开无尽的联想，得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结论。如果任由这种解读模式在济慈诗歌阐释领域不断拓展，如果割裂济慈诗歌文本的内在联系，对各个孤立的意象和语句进行略带片面的解读成为主流，必将严重挤占其他更为全面和合理的文本阐释的生存空间，令诗歌审美占主导、多元阐释为补充的传统济慈诗歌研究发生改性，蜕变为排他性极强的一元阐释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在各个层面上削弱济慈诗歌的伟大。

所以，笔者认为当代济慈研究者应该以更客观和更全面的视角看待新历史主义，进而以更包容和更开放的心态面对济慈研究的未来。首先要明确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强项和弱点，然后才可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量体裁衣。新历史主义济慈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宏观历史视野和宏大叙事能力，因此，在重构文学创作的历史空间时，具有其他理论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果使用得当，会产生考克斯所言的效果，即通过了解整个社会历史语境，通过了解同时期其他作家与目标作家的关系，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所研究的作家，把研究对象置于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里，既避免过于大而全的抽象也避免过于细小琐碎的个体研究（Cox 12）。比如，新历史主义研究可以告诉我们济慈和出版商围绕着《圣阿格尼丝之夜》里第36诗节的两性描写展开的争论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Farnell 407-408, Banerjee 539-540）；可以向我们展示以李·亨特为核心的所谓“伦敦佬”派（Cockney School）与当时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如何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和品味（Cox 6-7）；我们甚至可以探讨为什么济慈挣扎在创作出顶级诗歌与迎合大众口味之间，而同时期以现在的视角看来平庸无奇的作家康沃尔（Barry Cornwall, 1787—1874）当时却如鱼得水、风生水起（Turley, *Bright Stars* 6-7）。但是，一旦新历史主义进入济慈诗歌文本阐释领域，试图参与文本细读和解构工作时，很容易和济慈诗歌传统的、经典的审美理念发生冲突。总之，新历史主义理论在济慈研究领域应该恪守一个基本原则：即在社会历史语境重构领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但要克制其进入文本解读和阐释领域的欲望。

所以，当多元阐释逐渐成为济慈诗歌、乃至整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一种潮流时，作为时代的弄潮儿，新历史主义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巨大的学术价值。在回归历史语境，厘清诗人和诗歌曾经面临的客观实际时，新历史主义对整个济慈诗歌研究功不可没。但是，新历史主义的逻辑和论证思路固有的局限性，最终有可能扼杀济慈诗歌乃至整个浪漫主义诗歌在艺术性上的巨大功效。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地使用新历史主义是摆在每一位英国浪漫主义研究者，甚至是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anerjee, Jacqueline. "Mending the Butterfly: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Keats's 'Eve of St. Agnes'." *College English*, vol. 57, no. 5, Sept. 1995, pp. 529-45.
- Bate, W. Jackson. *John Keats*. Harvard UP, 1963.
- Bennett, Andrew J. "The Politics of Gleaning in Keats's 'Ode to a Nightingale' and 'To Autumn'." *Keats-*



- Shelley Journal*, vol. 39, 1990, pp. 34-38.
- Bloom, Harold, editor. *John Keats*. Chelsea House, 1985.
- Cox, Jeffrey N. *Poetry and Politics in the Cockney School: Keats, Shelley, Hunt, and Their Circle*. Cambridge UP, 1998.
- Evert, Walter H. *Aesthetic and Myth in the Poetry of Keats*. Princeton UP, 1965.
- Farnell, Gary. "'Unfit for Ladies': Keats's 'The Eve of St Agnes'." *Studies in Romanticism*, vol. 34, no. 3, Fall 1995, pp. 401-12.
- Finney, Claude. *The Evolution of Keats's Poetry*. Harvard UP, 1936. 2 vols.
- Friedman, Geraldine. *The Insistence of History: Revolution in Burke, Wordsworth, Keats and Baudelaire*. Stanford UP, 1996.
- Fry, Paul H. *The Poet's Calling in the English Ode*. Yale UP, 1980.
- Hartman, Geoffrey. "Poem and Ideology: A Study of Keats's 'To Autumn'." *The Fate of Reading*, U of Chicago P, 1975, pp. 124-46.
- McGann, Jerome. "Keats and Historical Methods in Literary Criticism." *MLN*, vol. 94, no. 5, Dec. 1979, pp. 988-1032.
- Mellor, Anne K. *English Romantic Irony*. Harvard UP, 1980.
- Keats, John. *John Keats: Complete Poems*. Edited by Jack Stillinger, Belknap-Harvard UP, 1982.
- 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
- [--- *John Keats's Letters*. Translated by Fu Xiuyan, The Orient Press, 2002.]
- .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Edited by Hyder Edward Rollins, Cambridge UP, 1958. 2 vols.
- O'Rourke, James. *Keats's Odes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UP of Florida, 1998.
- Ricks, Christopher. *Keats and Embarrassment*. Oxford UP, 1974.
- Roe, Nicholas. *John Keats and the Culture of Dissent*. Clarendon, 1998.
- Stillinger, Jack. Introduction. *John Keats: Complete Poems*, edited by Jack Stillinger, Belknap-Harvard UP, 1982, pp. iii-xxviii.
- Tate, Allen. *Essays of Four Decades*. Swallow Press, 1968.
- Turley, Richard Marggraf. *Bright Stars: John Keats, "Barry Cornwall" and Romantic Literary Culture*. Liverpool UP, 2012.
- . *Keats's Boyish Imagination*. Routledge, 2004.
- Unger, Leonard. "Keats and the Music of Autumn." *John Keats: Odes a Case Book*, edited by G. S. Fraser, Macmillan, 1985, pp. 181-94.
- Vendler, Helen. *The Odes of John Keats*. Belknap Press, 1983.
- Wootton, Sarah. *Consuming Keats: Nineteen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 in Art and Litera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责任编辑:杜娟